

# 信息政治学视域下的数据殖民主义研究

李 帅, 李震邦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数据殖民主义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殖民现象的概括性描述,其主要通过利用数字平台和网络设备实现对用户的全方位剥削。在西方左翼学者提出的资本主义批判范式中,数据殖民主义与信息政治学具有某种理论关联性,如二者都把“信息”当作其理论建构的基本要素,在对数字平台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上具有相近的看法,尤其强调建立开放共享平台的重要性,这为二者的对比研究提供了理论前提。立足信息政治学考察数据殖民主义需要厘清二者的辩证关系:一方面,信息政治学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变革的“元叙事”来夯实自身的理论根基;另一方面,数据殖民主义批判也需要从信息政治学中汲取数字时代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养料来拓展自身的理论深度和批判维度。

**关键词:**信息政治学;数据殖民主义;数字寡头;信息拜物教;数字公民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2-0033-09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2.005

## The Data Colon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tion Politics

Li Shuai, Li Zhenbang

(School of Marxism,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Data colonialism is a kind of general description of colonial phenomenon in the era of digital capitalism, which mainly achieves all-round exploitation on users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and network equipment. In the critical paradigm of capitalism proposed by western left-wing scholars, data colonialism and information politics have a certain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such as both taking "information" as the basic element of their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have similar views on the capitalist possession pattern of digital platforms, especiall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establishing an open and shared platform, both of which provide a theoretical premise for their comparative study. Examining data colonialism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politics needs to clarif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On the one hand, information politics needs to consolidate its ow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ased on Marxist "meta-narrative"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ritique against data colonialism also entails drawing theoretical nourishment on human liber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from information politics to expand its own theoretical depth and critical dimension.

**Key words:** information politics; data colonialism; digital oligarchs; information fetishism; digital citizenship

收稿日期:2024-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0&ZD044);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22YBA046)

作者简介:李 帅(1991—),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

李震邦(2000—),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持续印证这个时代的内在张力,“在技术‘社会化’与社会‘技术化’并行的时代,技术与人类命运已经息息相关”<sup>[1]</sup>。一方面,人工智能、网络云端、数据算法等信息化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类的生活与工作;另一方面,技术霸权、平台垄断等剥削手段以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牵扯着人类的生活。西方左翼学者尝试从不同侧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如蒂米·乔丹提出“信息政治学”,并以信息作为本体论展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信息政治学与数据殖民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理论关联,如二者都是从社交媒体和文化对象出发,考察数字时代下社交媒体、文化对象与互联网结合而产生的剥削与解放。这一理论关联性也为二者之间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作为数据殖民主义核心范畴的“数据”本身就是一种蕴含着特定信息的代码。在科克·内鲁等看来,“数据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得以存储和传递的一种途径。”<sup>[2]</sup>信息与数据具有同质性,只表现为内容(信息)和形式(数据)的差别,这是二者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存在论基础。另一方面,信息政治学与数据殖民主义的批判各有侧重,前者注重从信息传播的政治学角度寻求理论支撑,后者更侧重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展开批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信息政治学需要立足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变革的“元叙事”来夯实自身的理论根基;数据殖民主义也需要从信息政治学中汲取数字时代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养料来拓展自身的理论深度。

### 一、数字资本主义的“殖民化”趋向

针对资本主义内部发生的新变化,西方左翼学者提出了诸多理论范式,无论是意大利自治学派提出的“认知资本主义”,还是加拿大加速主义者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的“平台资本主义”,抑或是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提

出的“数字资本主义”,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并不意味着上述每一个理论范式的提出都是一次新开端,其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范式转变框架内的一个新发展阶段”<sup>[3]</sup>。在各类创造性的资本主义阐释范式中,“数字资本主义”最为深刻地揭示了数字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特质,实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特征的高度概括,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整体把握,可以说,对数字资本主义的“解剖”是理解其他理论范式的钥匙。

数字资本主义没有脱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其本质仍然是在资本逻辑驱使下以榨取剩余价值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以社会发展带来的技术手段变革为凭借呈现殖民化的趋势。虽然数字资本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结合方式,甚至掩盖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但是并没有改变劳动者是剩余价值创造者这一本质,且数据作为现在重要的生产资料,平台化趋势使财富更加集中,进一步加剧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差距<sup>[4]</sup>。从历史脉络上来看,资产阶级历经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早期殖民主义、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时期的殖民主义、二战后的新殖民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几个阶段;从殖民手段上来看,资产阶级的殖民方式开始从暴力手段逐渐转向温和、隐蔽的形式,实现了从暴力到温和、从公开到隐蔽、从经济殖民到数字殖民的转换;从基本形态上来看,资产阶级对资源的掠夺不仅仅局限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还加强了对“人类生命构成的数据领土”<sup>[5]</sup>的剥削。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殖民化现象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现实表征,尼克·库尔德利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考察了“数据殖民主义”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殖民方式的更替迭代,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再以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暴力垄断来延续

自己的统治,而是采取软暴力形式的殖民。从这种意义上讲,数据殖民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在数字时代的具体表现形式,因此,也属于新殖民主义的理论范畴。

数据殖民作为最新形式的殖民方式,依附于数字平台(库尔德利称之为“云帝国”),“是一种通过数据关系来侵占和榨取社交资源以获取利益的新兴秩序”<sup>[6](P45-50)</sup>。“云帝国”并不是列宁所言的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总体性的前景和由多类数据掠夺部门共同组成的商业组织”<sup>[6](P13)</sup>,是“社会量化部门”对用户数据无限限制提取的结果,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部门来实现殖民统治的目标:一是由掌握计算机语言的前端数字劳动者组成的开发系统或软件的数字寡头,主要包括微软、苹果、三星等平台;二是由中端劳动者所组成的创造互联网社交必要硬件设备与介质的数字寡头,如英伟达、台积电等平台;三是由后端劳动者组成的负责生产、利用、管理、维护平台的数字寡头,如推特、亚马逊等平台。在这个意义上,“云帝国”把个人在网络上留下的数据痕迹无偿占有并加以“萃取”,凭借数据霸权控制了数据生产者本身的行为和思想,借此实现自己从空间领域向精神领域的殖民目标。正如库尔德利等所说,“数据掠夺不仅是为了利润,而且也是为了控制人的生活和自由。”<sup>[7]</sup>凭借无偿占有用户数据的权力,数字寡头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剩余价值掠夺,并通过数字掠夺、资本输出、商品倾销等形式达成自身的殖民目的,这与马克思所定义的传统殖民主义具有很强的共通性。虽然数字殖民在殖民内容、殖民过程、殖民途径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殖民性质与传统殖民主义一致,并以数据关系为核心表现出来。

数据殖民主义将主体差异抽象为数字差异,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数据关系,由此来实现殖民的加强。所谓的数据关系是指,“一种新兴的社会形式,通过这种社会形式,数据殖

民主义作为一种提取过程,在个人、群体和公司之间维持稳定,从而可靠地促进了新的资本主义秩序的形成。”<sup>[6](P27)</sup>具体来说,数据关系就是个人在使用网络平台时通过同意网络授权、上传身份信息而形成的一种与其他用户之间的同质化信息。这种用户之间得以进行网络交往的同质化信息,本质上是用户为了获得平台使用权而对自己身份信息的一种让渡。而随着数据关系的扩张,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只有转化为数据才能进行交互,数据关系逐渐凌驾于其他关系之上并拥有了伪自然性的特点。但库尔德利极力反对将数据看作为“新石油”的庸俗观念,他认为这种观念掩盖了数字寡头对普通用户数据的无偿占有,是对数字寡头殖民本质的开脱。总的来看,数据殖民主义是建立在数据关系基础上的新的资源获取方式和新的资源分配方式,数字寡头利用平台攫取用户个性化的信息从而进行针对性地剥削与入侵,而正是这种用户之间个性化数据的存在为信息政治学的在场提供了基础。信息政治学和数据殖民主义都强调数据的占有、平台的属性、社会关系的异化,从二者具有可通约性的本体论出发,把作为形式的数据还原为传递内容的信息是探究二者之间思想联系的基础。

## 二、数据殖民主义的“前世今生”:从一般数据到信息政治

信息政治学的基本观点是:一旦数字媒体和文化对象与互联网的传播能力相结合,就会出现一种对抗性政治,信息政治正是这种多元政治的一部分,信息本身则是理解剥削和解放之间持续不断冲突的关键之一。

对剥削和解放途径进行探究的先决条件是对信息概念的把握,而对信息概念的把握不能只停留在内容与形式上,必须揭示其内核。首先,信息具有流动性。通常来说,信息作为一种“说者”与“听者”之间传递的亟待被接收的对



象,本身就是一种流动的概念。信息的传递必须借助某种手段或者介质实现实体与实体之间的传递,如果没有完成从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实体的过程,那么信息就没有完成交互而退化成单方面的内容。其次,信息具有差异性。蒂米·乔丹援引德勒兹的“差异”范畴,创造性地指出,“信息只存在于有差异的地方”<sup>[8](P13)</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息作为一种具体的差异是对同一性的驳斥,完全相同的东西没有差异,信息本身就是差异。如果实体之间传递的东西完全相同,这种东西也不是信息。最后,信息具有物质性。信息总是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中被构成,因为它总是嵌入到具体的社会形态中,对社会物质生活内容进行反映与揭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具有客观性,因而是物质的。信息作为一种流动的差异,当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相遇时,便自然而然地采取了数据的形式。

基于对信息概念的把握,我们能够以此为基础来考察数字时代殖民现象的本质。正如蒂米·乔丹所言:“一个群体必须失去一些东西,以确保另一个占主导地位或剥削的群体获得另一些东西……我将把这种关系称为‘动力’或‘权力’,它贯穿政治对抗。”<sup>[8](P5)</sup>数据殖民的本质就在于数字寡头凭借对信息的无偿占有形成一种凌驾于普通用户的权力,数字寡头通过对用户信息资源的掠夺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并不断扩大自己的统治范围。

在数据殖民主义研究中,数字寡头实现对信息的提取主要经过三个环节:第一步是“连接”。在数字时代,个人用户要想在贸易自由化、供应链全球化和资本加速流动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服务,首先要做的就是使其计算机与路由器建立互联网协议,使自己成为网络社会的一个节点。只有在这种网络协议建立之后,个人的互联网行为才能够被平台获取。也只有在建立网络连接之后,才会有社交网络、物联网、传感器等设备对社会和个人的量化,对信息的

无偿占有才成为可能。第二步是“监控”。用户通过联网进入到网络空间,通过签订网络协议而获得数字平台的使用权。用户在数字平台的每一个行为和留下的数据痕迹都被数字寡头无偿占有,数字寡头通过生物识别、数据分析、智能记录等科技手段完成对用户的“全景式监控”。第三步是“存储”。许多数字平台作为信息产生的场所本身并不被专门用来储存信息,用户在数字平台产生的海量信息被放到第三方平台(一个被称作“云”平台的资源储蓄池)上储存。“云”平台拥有大量信息的特性滋生了垄断,其通过控制信息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准入协议的标准,控制互联网环境和信息的使用方式,完成数字时代的数据殖民。

信息政治学的研究思路不仅与数据殖民主义批判相呼应,还通过引入“递归”概念拓宽了数据殖民主义的批判向度。递归作为一种算法,本身指的是程序调用自身的编程技巧,通常是指在一个整体的函数、参数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中,经过一系列的指令输入并产生输出。递归的结果不是输出结果的单调重复,其输入返回的产品越多,在递归中产生的信息就越多。这与数据殖民主义无限制攫取信息的理念暗合,并且由于已经嵌入到算法、计算机体系结构甚至计算本身的定义中,递归已经作为一种数据殖民的底层逻辑而出现。信息政治学视域下的递归,意味着在数字平台内部通过算法,“信息可以自我馈送,从而产生新的信息”<sup>[8](P43)</sup>。这种馈送既可以是来自用户提供的未被递归过的外部信息,也可以是平台自身经过递归而产生的新信息。由于信息之间具有同质性,信息馈送能够把传递不同内容的信息集成在一起,在一次次的递归中使得信息呈指数级增长。此外,递归除了实现信息数量上的指数级增长,还实现了信息内容上的差异化建构。用户在数字平台享受服务期间的所有差异(无论多么微小),都可以被应用到现有的搜索中。这利用了

诸如“每次查询的标点符号、查询的长度、在谷歌页面上停留的时间长度、第一个结果是否被点击、搜索者多快返回并再次尝试、搜索者的特征等差异”<sup>[9]</sup>,为数字寡头的精准剥削提供了基础。

在信息政治学视域下,用户通过同意网络协议使得自身获得在数字平台上进行交互的权利,他们在平台上由不同行为所产生的差异化信息在递归后被数字寡头无偿占有,构成了数据殖民。在这种理论框架下貌似形成了一种悖论:一些数字寡头从反复出现的个人信息中大量获利,这是一个明显的不公平现象。但是,如果将此视为一种不平等,就等于我们在研究中悬设了一种信息作为排他性财产的概念。递归本身就是信息的新形式,那么为了一致地将信息视为信息生产者的专有财产,用户个人信息产生的递归就应该被视为平台所有者的合法财产,因为平台已经产生了新信息。在这样的语境下,信息被理解为一种可以交换的私人财产,因而构成了一种交易——免费的信息换取免费的服务——这导致了对用户的剥削,并将他们的休闲或社交转化为免费的非物质劳动。数字寡头正是利用这种迷惑性,大肆宣扬他们对信息占有的“合法性”,带来了数据殖民主义的派生困境。

### 三、数据殖民主义的派生困境:信息拜物教的降生与主体性的缺失

韩炳哲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数据和数字有多全面,我们都无法仅仅通过它们完成自我认知。”<sup>[10]</sup>数字时代的症结在于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但没有成为用户的“避难所”,反而以一种虚伪的姿态钳制了用户本身。随着数据殖民的全方位入侵,用户成为自身“行为剩余”的奴隶,放弃了享有自主性和自由空间的权利,丧失了思考与批判的维度。库尔德利等也指出,“如果说历史殖民主义通过掠夺地理领土和领土征服可

能带来的资源而扩张,那么数据殖民主义则通过掠夺人类生活本身的更多层面而扩张。”<sup>[6](P5)</sup>数据殖民对社会和人类本身造成了剥削,在信息政治学视域下对数据殖民主义的研究主要可以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方面进行。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信息资源向数字寡头的进一步集中导致了信息拜物教的产生。舍恩伯格等指出,“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法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sup>[11]</sup>用户在各个数字平台上所产生的信息本来是杂乱的,但数字寡头能够凭借对信息的占有将碎片化的信息加以整合。平台用户在社会各个领域产生的知识、信息被数字寡头进行递归并分析,这使其具有了向多个领域渗透甚至支配该领域的能力。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原有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开始围绕被递归后的信息进行重组,在制造业、服务业乃至农业领域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数据生意”。正是由于信息完全被数字寡头占有,这种发生在经济领域的高额垄断利润的获利完全被数字寡头获取,信息拜物教的现象产生了。资本在运作过程中采取了数字技术、数字货币、数字商品等形态,而信息仿佛能够决定资本的最终走向并且带来大量的垄断利润,资本获利是信息指引下的结果。这就滋生了用户对信息的迷恋,好像信息有一种能够不断带来巨额利润的魔力,能够独立于社会生产过程成为一种单独的价值源泉。需要明确的是,对于资本拜物教的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完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私有制的作用,这些理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成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的垄断物,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sup>[12](P105)</sup>。信息拜物教的产生在本质上根源于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科学—技术的合理性和操纵性一起被熔接成一种新型的社会控制形式”<sup>[13](P100)</sup>。

信息政治学并没有停留于传统的批判框

架,而是从信息本身展开对拜物教的分析。蒂米·乔丹把信息分为“一阶信息”和“二阶信息”,其中,“一阶信息”指用户自身提供的信息,“二阶信息”指从已有信息中提炼出来的信息<sup>[8](P200)</sup>。提供“一阶信息”的用户在递归中与其他提供信息的用户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为其所属平台资本的“二阶信息”,并成为数字寡头获利的源泉。于是,作为个体明确差异的信息被赋予了一种魔力,受到用户自身的迷恋,因为它来自用户的自我特性。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言,“目前最耐人寻味的新兴宗教正是‘数据主义’,它崇拜的既不是神也不是人,而是数据。”<sup>[14]</sup>并且,一旦有人提供了关于自己身份的信息供平台使用,信息交换就不会停止,因为用户已经提供的信息可能与他们使用的服务有关,他们很可能会继续提供更多关于自己的信息。这样一来,用户只能在这种不断地自我榨取中“自我实现,实现至死。自我完善,完善而亡。”<sup>[15]</sup>

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数据殖民不仅造成了个人自由时空的消弭,还造成了个人自我意志的解构。首先,数据殖民带来了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全景式的监狱”,表现为“无限的生活资本化”<sup>[16]</sup>。从时间上来看,用户在数据殖民下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在日常生活中,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由休闲娱乐所产生的个性化信息在数字寡头眼中已然成为一种资本。而“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sup>[17]</sup>,数字寡头利用智能算法与信息递归对提供了个性化信息的用户进行侧写,并通过分析结果推送更多用户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迫使用户沉浸在数字寡头营造的信息世界中并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这种殖民方式不再以对抗性为特点,而是通过算法不断为用户提供刺激与诱惑,让用户时刻处于亢奋状态并甘愿奉献自身的全部时间来成就数字寡头的

殖民。在数据殖民背景下,很难提出比较周全的论据从根本上来捍卫自主、平等这些基本价值,而试图通过论证将其归于“自然主义谬误”的方式也难以对数据殖民的进程构成实质性的调整<sup>[18]</sup>。从空间上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劳动空间和非劳动空间的划分已经被打破。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打破了工业时代的劳作模式,现代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推动了分工方式的变革,并且随着交往方式便利化程度的提升,资本在逐利本性下面向全球寻找能够带来最高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这就直接导致了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强。传统围聚在工厂和办公室的劳动模式不再为资本增殖所需要,取而代之的是“零工经济”与“外包工作”的兴起。另一方面,原本作为用户休憩的自由空间在数字寡头的监视之下成为了透明的“监狱”,用户在这种“监狱”里的娱乐活动成为了无意识的剩余劳动过程。库尔德利等强调,“今天的普遍社会活动不是作为劳动,而是作为生产要素贡献剩余价值。”<sup>[6](P30)</sup>在这个意义上,数据殖民下的时间与空间异化不是两个独立的过程,而是数字殖民背景下个体生存困境的两个方面。

同时,以数字技术进步为前提的数据殖民导致了主体性的消解。数据殖民不仅客观上导致了数字平台用户的物质生活困境,还造成了一种去主体化的现象,意图用“自由的感觉”来置换“真正的自由”。数据殖民下主体的生命通过数字化进程加以表达,用户只有将自己的类本质转化成同质化的、能够在数字平台上流动的信息才能被纳入到现代社会中来。正如马尔库塞所言,“生产机构趋向于变成极权性的,它不仅决定着社会需要的职业、技能和态度,而且还决定着个人的需要和愿望。”<sup>[13](P6)</sup>囿于用户自由时空的异化,用户的自我意识沦为了数字技术进步的牺牲品。这种数字技术已经取得了强大的自律性和独立性,在技术理性的强制规整之下,用户已经丧失了批判的动力和勇气,成为



了“单向度的人”。数据殖民作为新自由主义的变种,不仅没有放弃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个人意志的围剿,还不断利用技术的更迭扩展自身统治的范围。马尔库塞在《反革命与造反》中对资本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进行了集中表达:“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sup>[19]</sup>数字寡头不断鼓吹“自由”“平等”,强调用户在这种单方面数据连接中的获益,其目的就在于隐蔽数据殖民带来的剥削本质。这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越加强化,用户越愿意在数字平台上传内容、分享信息,最终在不断的自我解构中完全让渡出主体内在的建构性。

信息政治学用“数字主体”与“数字公民”的关系来回应主体性丧失的问题。“数字主体”的概念源于信息作为一种排他性财产的悬设,用户在数字平台上创造了自己的数字身份,而“这些平台将身份作为财产的概念强加于人,以便将其交易为服务,然后将社交和娱乐转化为自由劳动”<sup>[8](P208)</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用户作为负责生产信息而被迫卷入到数字殖民中的“数字主体”,只能盲目接受数字寡头制定的生存规则而丢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而“数字公民”的概念也是基于这种悬设,认为信息作为一种财产可能会带来一种权利:让用户可以凭借开放的网络平台表达自己的诉求,实现对信息的集体占有,成为数字世界的公民。要想打破对信息拜物教的崇拜和实现用户主体性的恢复,只有实现从“数字主体”向“数字公民”的转型。

#### 四、走出数据殖民:一种信息政治学的尝试解决进路

马克思在对现代性的考察中已经发现了剥削关系产生的源头:“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sup>[20]</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据殖民的源头就在于数字寡头对信息的无偿占有。信息政治学

从信息的二重属性出发,为实现数据殖民下的解放提供了另一种解蔽途径。如果淡化信息作为排他性财产的性质,将彻底破坏信息作为一种权利所蕴含的潜力,并将使剥削能够更容易地进行。但如果仅仅片面地考察信息在资本主义应用中的排他性,而没有注意到信息能够“完全同时使用”的可能性,那么数据殖民主义下的解放仍然无法实现。在蒂米·乔丹看来,“如果信息成为一种竞争性商品,我们就会受制于它的所有者;只有实现了信息同时被完全利用的可能性,我们才会变得主动。到那时,我们可能会成为数字公民,而不是数字主体。”<sup>[8](P199)</sup>也就是说,必须要致力于构建一种用户和平台都能够完全使用信息及其潜能的社会关系。而实现这种社会关系的先决条件是发掘信息作为财产所具有的非排他性。

传统的殖民形式表现为一方获得另一方失去的东西,一个群体的富裕则必然带来另一个群体的贫困。如,工人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必须损失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不能同时拥有劳动时间。数据殖民的基本形式就是数字寡头对用户信息的无偿攫取,但这种一方因另一方的损失而得利的“零和”游戏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却有所不同。用经济学术语来说,信息是一种“非竞争性商品”,一方拥有它并不排除另一方同时也完全拥有它。由于信息本身具有流动性,其本身可以作为一种非竞争性商品同时被许多人持有,并可以通过更多人的持有而增加价值,这就为信息的“完全同时使用”提供了可能。

值得强调的是,信息不可能既被完全同时使用,又成为一种竞争商品,它必须只居其一。一旦信息被认为是非同时的不完全使用,那么它就可以通过从另一个群体中提取出来而只使一个群体受益,数据殖民就仍然存在。对数据殖民主义的批判要求“在肯定大数据的贡献之外,我们要看到大数据扮演的令人不安的角色,

让隐性的剥削变得显性,在宰制的话语中参透大数据的本质”<sup>[21]</sup>。在数字公民的概念中,潜在地包含了信息的同时完全使用,因为只有当我们将以这种形式获得信息时,我们才能充分利用它来产生更多的信息,并且打破数据殖民的藩篱。也就是说,我们对信息的理解不能基于17世纪物权法,即立足于信息作为排他性私人财产的悬设。真正能够实现解放的方法是实现信息从私有到共享的转变。

信息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产物,“它的生命力取决于它与现实的联系程度,取决于它是否有助于从‘究根’的角度分析并指导解决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sup>[22]</sup>。正如马克思一以贯之的观点,我们不能到原始森林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史,那不是我们的自由历史,那是野猪的自由历史<sup>[12](P5)</sup>。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递归后的信息被视作全体用户的共产物,每一位信息生产者都已经成为大数据网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要想实现解放,“不再仅仅是消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也包含了数据绝对的和透明的共享。这种共享势必让我们走向一个新时代,让私人数据垄断逐渐成为不可能”<sup>[23]</sup>。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信息政治学可以被看作是后现代社会中的一种小叙事模式。它并不把自己当作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唯一途径,而是把自己当作对资本主义总体性批判的一个侧面,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与其它剥削解放理论的联系之中,旨在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提供理论支援。在蒂米·乔丹看来,“信息政治并不是能够包罗万象的集合,并不能整合所有形式的解放;相反,存在有多种形式的剥削和解放途径,信息政治只是其中之一。”<sup>[8](P3)</sup>这为走出数据殖民的剥削提供了一种总体性的思路:既关注信息政治学的具体性质,又将这种性质与数据殖民所产生的政治对抗联系起来,即把数据殖民放在

资本主义社会的信息政治对抗中加以理解。只有在这种研究方式下,我们才能理解“信息”的本质,从另一种角度实现对现有数据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的超越,丰富与发展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

从信息政治学的视角考察数据殖民主义,必须看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存有信息关系还有生产关系,社会中的人不仅是数字主体还是数字工人,必须从信息政治学碎片化、多元化的叙事角度中确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另外,从“数字主体”向“数字公民”的过渡,创造性地回应了数据殖民下主体性缺失的问题,是对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据殖民背景下实现人的解放的理论贡献。

总的来说,虽然信息政治学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宏观层面的掌握,对数据殖民主义本质的揭示还不够透彻,只看到了实现数据殖民解放的可能性而没有看到其必然性,但在其理论框架下对数据殖民主义的批判性考察仍是有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各国对数据安全、数字鸿沟、个人隐私、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关切,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基于事实的政策导向,鼓励创新,建立互信……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sup>[24]</sup>我国必须立足以人为本的原则,消除数据鸿沟,改变少数人垄断信息资源而导致的两极分化局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数字命运共同体,构建能够让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数字平台,实现“数字公民”的在场。

#### [参考文献]

- [1] 易显飞.努力开拓技术哲学研究的新边疆[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42-48.
- [2] Kock N F, McQueen R J, Corner J L. The nature of data,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exchanges in business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process improvement and organisational learning[M].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1997:74.



- [3] Ulrich D. Privatization, curation, commodification: commercial platforms on the internet[J].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2019, 44(01): 181-197.
- [4] 易显飞, 沈康, 阳立高. 智能革命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影响与启示[J]. *创新*, 2021(3): 64-74.
- [5] 陆国亮. 数据殖民的物质痕迹: 数据殖民主义理论与媒介基础设施研究的对话[J]. *新闻界*, 2022(6): 86-96.
- [6] Couldry N, Mejias U A.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7] Couldry N, Mejias U A. Making data colonialism liveable: how might data's social order be regulated? [J]. *Internet Policy Review*, 2019, 08(02): 1-16.
- [8] Jordan T. Information politics: libe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digital society [M].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 [9] Levy S. In the plex: how Google thinks, works, and shapes our lives [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21-25.
- [10] [德]韩炳哲. 精神政治学 [M]. 关玉红,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82.
- [11]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 [英]肯尼斯·库克斯. 大数据时代: 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 [M]. 盛杨燕, 周涛, 译.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75.
-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3]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 [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 [14]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 未来简史: 从智人到智神 [M]. 林俊宏,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311.
- [15] [德]韩炳哲. 他者的消失 [M]. 吴琼,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 57.
- [16] Couldry N, Mejias U A. Data colonialism: rethinking big data's rel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subject [J].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19, 20(04): 336-349.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99.
- [18] 易显飞. 新兴人类增强技术与人类未来: 兼评《增强、人性与“后人类”未来: 关于人类增强的哲学探索》 [J]. *科学·经济·社会*, 2023(1): 129-132.
- [19] Marcuse H. 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 [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4.
-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8.
- [21] 陈小燕, 陈龙. 数据殖民: 算法传播与人文精神的消弭 [J]. *中国编辑*, 2020(6): 36-41.
- [22] 易显飞, 张扬. 技术哲学应首先关注技术创新的哲学问题 [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 18-20.
- [23] 蓝江. 一般数据、虚体与数字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2: 38.
- [24] 习近平: 中方愿同各方探讨并制定全球数字治理规则 [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21/content\\_5563266.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21/content_5563266.htm).